

近代日本知识人之上海观察

吴敏闻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上海 201102)

摘要: 以“千岁丸”开启的上海之行作为切入点, 呈现明治至大正年间部分游记中的上海观察。在“县城”与“租界”的选择中, 游记作者出于各自的立场微妙地倾向一方, 勾勒出不同的上海城市形象。不同的观察视角在历史舞台上此消彼长, 体现的是日本社会对于上海这座城市“集体想象”的变化, 与近代日本对华观的变化、近代日本亚洲主义“变异”紧密关联, 是日本近代“文明中心论”转移的具体表象。可以说, 近代日本知识人对于上海城市形象的构建都能在这一变化线上找到其相应的位置。

关键词: “好意的苦言”; “盖被”说; “日本的天职”; 日本亚洲主义“变异”; “文明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 K2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3-0129-05

The Observation of Shanghai of Modern Japanese Scholars

WU Minwen

(School of Tour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41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ip to Shanghai” opened by Qiansuiwa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bservation of Shanghai in part of the travel notes taken from the Meiji period to Taisho period. In the choice of “county” and “concession”, the author delicately tend to one side out of their positions, outlines the different images of Shanghai City. Different viewing angles change all the tim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is connected closely with changes in attitudes of Japan towards China and Asianism “variation”, and concretely represents the transfer of “Civilization Center Theory” in modern Japan. The observation of Shanghai of modern Japanese scholars can be found its corresponding position in this change line.

Key words “friendly advice”; “cover” theory; “Japan’s inherent responsibilities”; Japan’s Asianism “variation”; “Civilization Center Theory”

近代日本知识人关于上海观察的记述颇多, 有旅行纪文, 也有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等等, 呈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上海的社会万象。各种差异体现了作者不同视角下对上海这个“他者”的观察, 看似复杂多面, 却有其内在关联。本文试以明治、大正年间的部分代表性游记为例, 对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上海观察作一个追溯, 勾勒其变化轨迹, 揭示其内在联系。

一、“千岁丸”之行——选择的开始

在论述明治、大正年间的游记之前, 首先必须论及的是 1862 年幕府官船“千岁丸”的上海之行。这是日本隔断与中国 200 余年交往后的首次官方使团考察, 留下了高杉晋作等人关于上海的首批纪行文

收稿日期: 2016-02-15

作者简介: 吴敏闻(1978-), 女, 上海人,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日语教学。

字,初步形成了繁华光鲜的租界与落后肮脏的县城、飞扬跋扈的洋人与软弱卑微的中国人等对比性描述,并在后来成为左右近代日本知识人观察上海的“套话”。如高杉晋作曾这样描述华洋二界“城外城里皆外国人商馆,故繁盛。所见支那人居所,多贫者,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牟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1]如此对华洋二界的观察法也影响着后来的访问者。正如刘建辉所说,“租界”与“县城”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访问上海的人也许面临同样的“选择”——“租界”还是“县城”,“只要在心中微妙地倾斜于一方,那么就决定了他‘接近’上海的角度。在不同场合下,甚至有可能改变了他那种上海体验的意义”。^[2]这里的“租界”象征着西方的殖民文化与衡量尺度,“县城”则代言了日暮西山的“老大中国”和被殖民的软弱悲哀。“选择”是对曾经发挥向心力的中华文化的重新审度,也是对西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不同程度的认同。

“千岁丸”的此次考察是日本幕府末期面对“西力东渐”,如何避免重蹈中国覆辙的“殷鉴”^[3](总论)之旅。在唐宋以来的“慕华”意识尚有“余威”以及“唇亡齿寒”的感受下,高杉晋作等人的访问是“带着友善的目的前来研究中国的”^[1]。对于晚清国势衰微、民气低迷虽然也有闪现的小视心理和“纵横中国”的狂言,但是更多地抱有同情心和痛惜感。如纳富介次郎多次称清朝是“文学无双国”,但如今却落得“虚文卑弱”,“内受长匪之苦,外为夷狄挟制”,形势“危如累卵”,他一再感慨道“可叹之至”。而高杉晋作一向敬重中国为“尧舜以来堂堂正气之国”,到近代竟被西洋人所欺凌,政治腐败、低能,归结为“君臣之不得其道故也”。^[1]由此可以看出,高杉等人在仰慕“租界”繁华的同时,心理上还是倾向“县城”的,才引出诸多叹息和批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心理下,“千岁丸”访问团开启了近代日本人观察上海的选择模式。

二、“好意的苦言”

“千岁丸”之行打破了幕末“锁国体制”,日本政要、学者、民间组织等竞相来到中国游历考察,纪行文字中对于上海“租界”与“县城”的“选择”,开始出现了分化,上海的城市形象亦在“选择”中被重构。这里首先要论述的是明治时期两部著名的汉文体中国游记,即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1879)和冈千仞的《观光纪游》(1886)。从这两部游记中的上海观察颇能一瞥当时日本社会的“选择”倾向。例如竹添的游记中有一首诗《沪上岁暮》,其中有一句“绿眼红毛争互市,嗷鸿饥鼠泣孤城”,形象地概括了竹添眼里的上海,表现了当时西方列强在上海租界的利益争夺,以及清人的贫困和上海被洋人把持、孤立无援的处境。而另一位汉学家冈千仞对于上海的观察侧重在“烟毒”,在其《观光纪游》中多次提及上海的烟馆。如在《烟店歌》中写到“沪上繁华千万家,中有烟馆拥大路”,足见当时清人吸食鸦片之颓靡风气。冈千仞对此深感痛惜,认为“沉湎烟能移人性,憔悴烟能缩人命”,然而“烟毒盛行”系谁之过?诗文中继续写道“此事坐视不敢问,泄泄谁谓国有政。呜呼蚩蚩之民有何罪,呜呼蚩蚩之民实无罪”,尖锐地道出问题所在。冈千仞认为“烟毒”是中国社会与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烟店歌》中的针砭之言是对上海繁华背后的担忧,是对清政府的善意拷问。正如鲁迅曾说“冈氏距明治维新后不久,还有改革的英气,所以他的日记(指《观光纪游》)里常有好意的苦言。”^[4]

可以说,两位汉学家在上海的体验基本延续了高杉晋作等人一分为二的观察法,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县城”。对于“租界”的繁华,竹添看到的是欧美列强间利益的争夺,对“县城”老百姓抱以同情。竹添认为,中国的“萎靡不振”就好比“患寒疾者为庸医所误”,“然其中犹未至衰羸,药之得宜,霍然而起矣。”冈千仞笔下的“县城”依然“市廛杂沓,街衢狭隘,秽气郁攸,恶臭扑鼻”,与“康衢四通”、“昼夜喧嚷”的“租界”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也表达了对落后“县城”百姓的关切,而对陷民众于水火的大清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因此,就“千岁丸”观察之后的“选择”而言,两位汉学家心理上依然是“倾向”于“县城”的,试图从深层次帮助中国找出原因,希望中国能改革弊端,振兴国力。事实上由“千岁丸”开启的实地考察,让日本社会上下对于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大清国认识更加清晰,对中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和策略也出现各种争论。两位汉学家观察上海的视角与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社会颇有影响的“中日连横论”、“兴亚论”等主张遥相呼应。像中村敬宇就在竹添的《栈云峡雨日记序》中正面论述了应与中国“亲厚”,并列举出四个理由“文字同”、“人种同”、“辅车相依,唇齿之国”、“黄种危

矣”。但是“中日连横论”的政策主张,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及进步,中日国力的此消彼长,影响力减弱,“兴亚论”的内涵也发生变质,日本社会看待中国的眼光离“好意的苦言”愈来愈远,告别“恶友”中国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诸多纪行文中对上海观察的立场也发生变化,在“租界”与“县城”选择的摇摆中发生了倾斜。

三、“盖被”说

小林爱雄是近代日本的诗人、作词家和翻译家,是最早推动和创立日本歌剧者之一。他曾在1908年底来中国旅行,并于1911年出版了《中国印象记》一书。他的来华不同于“千岁丸”访问团的官方性质,也不同于竹添和冈千仞二人作为外交官或因为汉学家的“自负”来侦知中国国情,探索中日关系及东亚地区的将来。小林是不带有调查使命和考察色彩的个人游历,游记轻松随意,体现了时代背景下作为日本普通民众观察中国的视角。小林中国旅行的第一站便是上海。

在离开日本,享受着德国客轮上“西洋文明”的愉悦心情下,小林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宛如是一幅南宗国画”,对“早有耳闻的上海一景——苦力”感慨说“世上生活最凄惨的或许要数这些苦力。”之后小林选择了四个角度勾勒了对上海的观察,分别是“Aster House”、“高官的家”、“张园、愚园”、以及“四马路的红灯”。“Aster House”是“上海最好的旅馆”,上下六层的电梯、轻轻开启的自动门、华丽的洋人、能说几句英文的中国服务员等让小林感觉“心情愉悦”、“舒适”;“尽管饭菜里带有一点中国色彩”,但是“无论是餐桌还是餐具,室内所有的一切毫无冲突地构成了和谐的格调”。“Aster House”可以说是“西洋文明”的代言,小林的美好感官体现了明治维新之后“西洋文明中心观”在日本民众心里的主导地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官的家”(指盛宣怀的府邸),代表迂腐、没落、革新无力的中国统治阶级。那是一幢“半欧半清的建筑物”,室内“所有的家具散发着黑光”、“四处很难找到有生机的东西”。盛宣怀虽然是“日本归来的洋气十足的大人”,却有着“无须劳动”的“两寸多长的指甲”,他“满不在乎地把鱼骨直接吐到洁白的餐桌布上”的情景让小林觉得“滑稽”,就连进出的仆人也“丝毫体现不出对主人的敬畏之情”。最令小林感觉不舒服的是中国的“筷子”,“好像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前端带着黑色的被牙齿咬过的痕迹”,令人联想到“亡灵”、“觉得筷子上冒鬼气”。张园、愚园是小林眼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落脚点,张园内“生活轻松惬意”和“租界街头充实紧张”形成对比;愚园的建筑有些古怪、气氛沉闷,“中央有水池,看不到水有任何流动的迹象”,不过“长廊上挂着歌德的诗,由此可以明显觉察到西方文化入侵的痕迹。”小林在参观完张园、愚园之后感慨“上海开化已有六十余年,在此期间,租界的西式建筑从三层变成了六层,宽度从四米变成了八米,但中国的街道依然一成不变。在此体现了新旧文明的激烈对抗。在不久的将来,当中国人到了自觉崛起的时候,新旧思想的冲突将会尖锐地涌出吧。”小林在验证当时鼓吹的“中国文明停滞论”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背后隐藏的力量不可小视。不过,小林对上海的描述最后定格在“集上海夜晚的繁华于一处”的烟花柳巷——四马路,让“不可小视”似乎又发生逆转。在那里小林听到的是“悲凉的清朝乐曲”,看到的是“个个看上去都像小孩子”的中国妓女和“中国人公然游玩的侠气或虚伪”。“烟花柳巷的快活风情能让人暂时忘掉一切”,摩肩擦背的行人沉醉在四马路的“虚幻”之中,“将生命溶入到四马路的红光中顺江而流”等描述与小林在游记的自序中把中国形容为“沉睡国家”相呼应——“现在的人们已毫不在意,只是沉醉在美酒和鸦片的香味中悠悠沉睡”。

小林对“租界”和“县城”的描述,已经不是单纯的“一分为二”,他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过在“西洋文明中心论”的影响下,对于中国人的“崛起”和“新旧文明的对抗”却持有怀疑,并以“虚幻”、“沉睡”之名,抛出了“盖被”说——“‘沉睡的国家’有觉醒的那一刻,我们须在一段时间内为他们盖上被子好生照顾,等他们清醒后手拉手地一起前进。”而就前文提到的关于“租界”与“县城”的选择而言,小林没有表现出一般日本国人在经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后膨胀起来的“民族优越感”而一味诋毁中国,对于“县城”的将来表现出“关注”。只是这一“关注”与冈千仞等汉学家善意的忧虑相比已然发生变质,前者在“盖被说”的遮掩下隐藏了“开发”中国的隐蔽侵略之实质。小林游记中之后在北京日本使馆里的对话摘录更加能够验证这一“关注”的落脚点“应该有更多更多的日本人研究中国,来中国开发事业”、“每年以五六十万的速度增长的日本人,将来埋放骨灰的青山,除了中国还有哪呢?”

四、“日本的天职”

明治、大正年间游历中国的日本知识人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内藤湖南与德富苏峰值得一提。他们的游记中对于上海之观察倾向性明显,县城与县城的人们已少见笔端,多着眼于如何让日本在“租界”获得比欧美列强更多的利益、谋划更好地瓜分中国的模式,比起小林的“盖被”说来,体现了更多“开发”中国的深思熟虑。

内藤湖南于1899年第一次游历中国,并将游记汇编成《燕山楚水》出版。游记中记述上海是“东方第一大码头”、“江南的好去处,没有能超过这里的”,可见其对上海的赞誉之情。只是“上海的日本领事馆简陋狭小”、“居留在上海的日本人有一千多,而有资格参与市政的只有十三四人”,显然内藤对日本在租界的地位颇有不满。而日本的商店也大多“外观简陋”,似乎发展不尽如人意,这让内藤感觉“战胜的余威(指甲午战争)在这里毫无显现,上海不是一个惬意的地方”。反观上海的中国人,“得意洋洋地纵横于康衢大道上,俨然把外国人居留地当做了自己的地盘。”这体现了内藤作为殖民者立场的忿忿然心理。尽管如此,对于通过“租界”这种形式瓜分中国,内藤是极为肯定的,并在游记中以“关于清国的专管租界”一文谈论上海租界的模式。在内藤看来,“对于中国人来说,本国政府的权力不能涉及的地方,反而比本国政府管辖下的其他地区更加安全,上海租界的繁华,大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使中国人感受到西欧政治好处,上海的租界确实很有贡献。它获得人心的作用,绝不亚于用精锐的兵器或战争光荣的胜利。”因此内藤认为,要谋求苏杭等地区日本租界的繁荣,“应该着眼于通商以外的利益,以便积极地利用租界”,并“以此为模范行政区示范给中国人看,用变法带来的利益开启中国模仿变革的道路。”“模范行政区”的设想,体现了内藤谋求以日本为主导“变革”中国的思路,是游记中“日本的天职”论调下的具体策略。游记中写道,“日本的天职”就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光被坤舆的天职。……我们天职的履行必须以中国为主要对象。”正如“模范行政区”的设想让内藤妄想“如果有了上海的优点,而没有上海的暴虐,那么租界的繁荣不出三年,就会感到现在的面积过于狭小”一样,“日本的天职”论调期待的是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文化渗透,最终实现日本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位史学家德富苏峰对上海的印象亦十分“美妙”。在其《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中记述了他初抵上海时的情景:“江岸上杨柳依依,农田、苗圃青翠,鹭鸶、房屋洁白,再加上滚滚江水,交相辉映,宛若一副美妙的画卷呈现在眼前。”1917年德富苏峰再次造访上海,在《中国漫游记》(1917年)中留下更多关于上海的记述。不过,和内藤湖南一样,除造访当时中国各派人物之外,游记中德富苏峰对于上海的关注点也多在租界地区。他参观了日本人俱乐部,和内藤18年前参观日本领事馆时的感觉大不同,觉得俱乐部“非常让人满意”,“作为日本在上海的代表,它是完全够格的”。同时,“比起以前,日本人现在在上海可谓是大摇大摆,非常威风。”并自豪地认为“日本人能有这样的派头,一部分是因为战争的影响,一部分是日本国运昌盛的恩赐。”德富苏峰还参观了建在苏州河岸的日本内外棉公司,在与武居绫藏董事的交谈中提出了在中国发展经济事业的畅想:“既然在中国建立了纺织公司,有没有想过更进一步扩大事业呢?”“比如创立制棉公司以改善原料。”“中国的棉花资源非常丰富,如果今后能开垦蒙古和新疆的话,那更是取之不尽。”在政治层面上,德富苏峰也看到了“不足”——“上海自治政治的九名评论员中,日本人只有一位。”并提出“如果我们在上海的日本人,能够相互协助,使得更多的人具备评论员资格,那我们在上海将更加便利。”如此种种,充分显露其在政治、经济上掠夺、控制中国的野心。“故人多处是吾乡”,足以表达德富苏峰对上海的“亲近”之情,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上海作为南方的要塞,聚集了各个国家,宛如一个小共和国。……在上海,天高地厚,没有压迫感,我可以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德富苏峰俨然把上海当作一个殖民者乐园了。

上述两位史学家上海观察的立足点不谋而合,尤其是内藤湖南的“日本的天职”论,在当时“亚洲联合”、“提携合作”口号的掩护下,声称中华文明的接力棒已转入日本之手,日本有资格充当亚洲盟主,进而通过政治控制、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等“和平”方式,实现占领中国的企图。而德富苏峰游记中的“苦力大明神”说恰好成为应该“和平”占领中国的佐证之一。在苏峰的游记中没有鄙夷上海苦力之类的“套话”,相反“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真正光辉,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真正生命力和精神

气息。苦力们是中国的恩人、救世主,可谓苦力大明神”。可以说,“苦力们”顽强的生命力和精神气息正是殖民者们所畏惧的吧。

五、总结

上文以“千岁丸”之行开启的“县城”与“租界”间的“选择”为切入点,论述了明治至大正年间几部有代表性游记中的上海观察——或“华洋二界”冰火两重天、或在新旧思想冲突中沉睡未醒、或如南国画卷,一派“繁荣”景象。不同的选择带给作者的上海体验有善意的忧虑、蠢蠢欲动的关注,也有高高在上的美妙。游记作者个体间的差异投射的却是日本社会对于上海这座城市“集体想象”的变化。在“千岁丸”实地考察之后,日本社会在认知论上进一步确认了中国的“守旧”、“落后”、“衰弱”,在行动上畏惧与轻视、“亲善”合作与敌视等争论一直在持续,并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最终确立了蔑视、征服等观念的统治地位。在“县城”与“租界”间的选择,演绎的正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观的变化,也是近代日本亚洲主义内涵的“异变”。

杨栋梁结合盛文在《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中的考证,将日本亚洲主义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把“早期亚洲主义”分为“朴素”、“策略”和“征服”^[3]三种类型,它们在历史演变中互有牵扯,此消彼长,最终征服型亚洲主义占据了主角地位。上述游记中汉学家的观察正体现了早期朴素型亚洲主义的视角,尤其是竹添进一郎。他曾是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成员之一,该团体主张“白人无道”,亚洲已成为“碧眼人掠夺之地”,“同文同种”的亚洲人“辅车相依”,应“同心同德振兴亚洲”。虽然这些主张最后演变成成为“大亚洲主义”的侵略口实,但在当时对竹添观察上海的视角是起着积极意义的。小林爱雄的“盖被”说和内藤湖南的“日本的天职”论则体现了策略型亚洲主义的特征。甲午战争之后,很快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得日本膨胀起来的“东洋盟主”意识受挫,“亚洲提携”、“中日结盟”的主张再次抬头,进而发展为颇具欺骗性的“保全中国论”。内藤湖南曾加入的东亚同文会正是鼓吹这一主张的团体之一。其主流思想洋溢着亚洲连带的理想主义情怀,强调同种同域的亚洲人携手互助,而率先跨入“文明之域”的日本有责任也有能力“扶掖”和“保护”中国免遭列强的吞并或瓜分。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最终侵略型亚洲主义占据上风,并促成了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游记作者们的上海观察体现了日本亚洲主义的“变异”,是日本近代“文明中心论”转移的具体表现。在鸦片战争以前,以中国为主导的“大陆文明”是日本仰慕的标杆,因此游记中汉学家们出于对“大陆文明”的留恋,对于中国的处境多关切之情。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强盛国力,福泽谕吉倡导的“西洋文明中心”论占据主流,一切以西方文明为模版的论调促成了小林爱雄观察上海时的一边倒,汉学背景残留下的余威仅仅是令小林感慨新旧文明间的冲突,却无法改变其“消亡”的论调。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最终催生了试图以日本中心主义取代或对抗欧洲主义倾向的“亚洲一体论”和“东西文明融合论”,内藤湖南的“日本天职论”和德富苏峰的殖民策略正与其遥相呼应。这正如孟华所说“游记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体想象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象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学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5]因此,可以说近代日本知识人游记中塑造的上海城市形象都能在亚洲主义“变异”和“文明中心论”转移的变化线上找到其相应的位置。

参考文献:

- [1] 冯天瑜. “千岁丸”上海行: 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 刘建辉. 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3] 杨栋梁.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4] 鲁迅. 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之“皇汉医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5]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一心)